

# 龚鼎孳与皖江遗民

李学军

明清易代，被称为天崩地解的历史巨变。身处乱世，以身殉节者有之，奋起抗击者有之，退隐乡野者有之，归顺新朝者有之，变化不定者也有之。入仕清廷的“贰臣”与效忠故国的“遗民”，彼此归属不同的政治阵营。按理说，二者水火难容，势不两立。但是，他们相互之间，或师生好友，或同乡同年，或姻亲朋党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并非格格不入。实际生活中，除了“政治关系”，还有“感情关系”；除了“官方关系”，还存有“民间关系”。况且，政治上的分歧并不妨碍他们在文化上的认同。

因此，虽说各自选择的出路不同，“贰臣”与“遗民”之间并未断绝私人往来。其中，身为清廷高官的龚鼎孳与前明遗民的交往就颇受关注。

一

明末清初之际，合肥人龚鼎孳声名显赫，人称“龚合肥”。入清以后，龚鼎孳屡沉屡浮，官至刑部尚书、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。

龚鼎孳在文学方面颇有建树，诗、词、文俱佳，作为著名诗人，与钱谦益、吴伟业并称为“江左三大家”，成为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。

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，与遗民接触，可能受到牵累，有些人或许会因此避之不及，甚至坚决划清界限。可是，龚鼎孳颇念旧谊，与那些遗民和抗清人士多有往来。

清初，朝廷强令遗民出仕，这种“高压政策”可能危及归隐士子的性命。龚鼎孳对此竭力劝阻，在上疏中，他大胆建议朝廷：“任止进退之间，不妨渐从其适，使天下知朝廷所贵者，在乎廉静寡欲之士，而不在于喜事躁进之人。”（《条陈吏治疏》）

在庇护和资助遗民朋友方面，龚鼎孳一直尽心尽力，甚至不惮风险。他曾言称：“人生贵识大义，某岂恋旦夕一官，负天下豪贤哉！夫以忠义再罹难，吾不能忍矣。”（阎圻《文节公白奔山人传》）

顺治十年（1653），遗民陶汝鼎身陷叛案，论以死罪，时任刑部侍郎的龚鼎孳竭力周旋疏通，为之开脱。

顺治十一年（1654），遗民傅山受到山西谋反案牵连，龚鼎孳当时身为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全力营救，审讯后以“实不知情”使其获免。

因为此类事件，龚鼎孳受到顺治皇帝“点名批评”，并遭到严惩。顺治十二年（1655）十月，顺治皇帝下诏，斥责龚鼎孳“若事系满洲，则同满议，附会重律；事涉汉人，则多出两议，曲引宽条”，认为其“不思尽心报国”，被降八级调用。

但是，龚鼎孳并没有因此有所收敛。康熙年间，他再度受到重用，先后出手营救了伏案在身的遗民丁耀亢、阎尔梅等人。

郭则云《十朝诗乘》云：“龚鼎



方以智像

孳在朝，务保全士类。故虽身事二朝，而论者犹谅之。”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计六奇以“笔挟风霜”著称，在《明季北略》中，他虽将龚鼎孳归于“至已死而未死者”之类，却以为“君子犹当谅其志焉”。

杜濬属于遗民中的“死硬派”，极为耿介简傲，但与龚鼎孳一直保持交往。他认为：“君子之学，出处二者而已。出处之道，处以为身，出以为民而已。处以为身者，当如宣城沈耕岩先生；出以为民者，当如合肥龚芝麓先生。”这番话体现了难得的“民本”思想，充分肯定龚鼎孳以关心民生疾苦为己任的义举。

二

著名学者严迪昌在《清诗史》中，专门设置章节，论述《以方文、钱秉箴为代表的皖江遗民诗人——兼说地域文化世族》，对皖江遗民诗人予以高度评价。龚鼎孳和一些皖江遗民既是诗友，也是皖籍老乡，他们彼此信任，关系密切。

在《印法参考序》一文中，钱澄之写道：“昔龚端毅公与予论诗，予进曰：公诗大佳，但好和韵固是一病。”由此可见，钱澄之与龚鼎孳之间交情不浅。

钱澄之（1612—1693），初名秉箴，字饮光，一字幼光，晚号田间老人、西顽道人。安徽桐城（今枞阳县）人。明末诸生，抗清志士。据有关资料，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冬，时年六十一岁的钱澄之赴京师，寓居龚鼎孳处，流连一年之久，直至龚鼎孳翌年去世。

《田间诗集》中，钱澄之有多首诗作提及与龚鼎孳的交游。如《雨中同方虎、亦友陪龚宗伯过圆觉寺》《陪龚宗伯饮王氏园，即事寓怀》《宗伯请告后，同过兴教寺，和壁间宗伯韵》《定武阍》等。

在《病起哭龚宗伯八章·其二》中，钱澄之写道：“通籍登朝四十年，上卿身后特萧然。交游屡散千金橐，归去曾无二顷田。医店尚赊扶病药，债家空指助丧钱。平生长物偿人尽，刚剩堆床旧卷篇。”

龚鼎孳虽然入仕新朝，但重义轻财，对老友新朋鼎力相助。因为乐善好施，离世时家财几近耗尽。吴伟业谓其“倾囊橐以恤穷交，出气力以援知己。”从以上诗句中，可知此言不虛。

方文（1612—1669），原名孔文，字尔止，号蠡山，又名一束，别号淮西山人、明农、忍冬子，安徽桐城人。明末诸生，入清不仕，靠游食、卖卜、行医或充塾师为生。明亡之后，方文移居金陵，与当时遗民文人诗酒流连，游荡江湖。

《明遗民诗》称方文“性不能容物，常以气凌人。有以诗投者，必曲为改削。”但是，颇具个性的方文与龚鼎孳却成为好友。

方文《蠡山集》和《蠡山续集》中，有多首诗作记述与龚鼎孳的交往，如《广陵饮龚孝升太常寓斋》《中秋龚公芝麓复集稻香楼》《喜龚孝升都宪至》等。龚鼎孳写有《和答方尔止》，其中有“放帆归故国，留客老天涯”“他日重扶醉，还来绣佛斋”的诗句。

往来之中，二人还互赠礼物。顺治五年（1648），龚鼎孳卜居扬州。方文应邀参加其生日聚会，作有《广陵饮龚孝升太常寓斋》祝寿庆贺。龚鼎孳写有《和答方尔止》，其中有“放帆归故国，留客老天涯”“他日重扶醉，还来绣佛斋”的诗句。注曰：“时以墨绣大士见贻”。

墨绣，又称发绣。是以人的头发代替丝线，精心绣制而成的艺术品。大士，指观世音菩萨。由此可知，方文曾向龚鼎孳赠送发绣观音像作为生日贺礼。

龚鼎孳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后，仍与方文保持联系。在《龚孝升总宪以古色轻绒褥见惠谢之》中，方文写道：“客路虚休夏，还山且过冬。只应拥败絮，曷敢藉轻绒。佳况意何厚，深辞惧不恭。南屏霜雪里，披此看严松。”

三

方以智（1611—1671），字密之，是“明末四公子”之一。他虽比方文大一岁，却是其从侄，二人同学十四年。

任蕲水县令时，龚鼎孳就与方以智相识。入京之后，龚鼎孳与好友们时常相聚于方以智的曼寓，诗酒唱和不断。

据龚鼎孳《怀方密之序》所记：“密之以文学行谊擢史局，充王府讲官（注：崇祯十五年二月，方以智充任定王讲官），稍稍荣遂矣。而余是时亦适以征书至阙下，与密之鸣咽相对，如送中丞时。已，密之时时过余为文酒之戏，岸愤歌呼，各道少年事为娱乐，明星在天，下视酒人，其意气拂郁，有不可俯仰者。”

《龚鼎孳全集》中，《题曼寓联句诗后》《为密之催妆同秋岳于皇尔唯如须限韵三首》《方密之曼寓初成招同曹秋岳姜如须张尔唯宴集限韵》《中秋同阎古孝廉集方密之太史曼寓分韵》等诗文记述了二人入京后的交往。

甲申之变中，龚鼎孳和方以智都没有选择死亡。入清以后，他们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。龚鼎孳转仕新朝，方以智则参加反清复明活动，后出家为僧，发愤著述。两人的交往也随之中断。

龚鼎孳一直怀念自己与方以智的友情，其《定山堂诗集》中，除《怀方密之》诗以外，还有《又感述四首》。诗中其二有句云：“不知帐下陈旗鼓，何客能为杀美人。”句后自注云：“此密之当年调笑语。”其四有诗句云：“供奉夜台秋草碧（自注：舒章歿于燕邸），方干诗句吟猿愁（自注：时闻密之转徙两粤）。”

方以智的次子方中通（1634—1698），字位伯（位白），号陪翁，清初著名数学家、天文学家和著作家。方中通在京时，谒见过龚鼎孳。

在《父执龚芝麓惠墨》中，方中通写道：“扫门相见易，不似客燕京。犹念故人子，原非人世情。拖青怜鄙愿，守黑尽余生。万杵轻烟墨，贻予书可成。”

“不似客燕京”句后注云：“特命闾者，予至即传。”“贻予书可成”句后注云：“时余将著《数度衍》。”

从这首诗可知，方中通曾登门拜访龚鼎孳。龚鼎孳对其非常热情，特意嘱咐家中守门人，如中通前来，须立即禀告，后又赠中通以墨，助其《数度衍》书成。

当时，方以智仍然在世。如果没有其父许可，方中通可能不敢轻易上门拜会龚鼎孳。

陈康祺《郎潜纪闻四笔》记载：“合肥龚尚书鼎孳，爱才如命，通儒老学，俱从之游。”当时，龚鼎孳在朝野各界，尤其是遗民群体和文人圈子中颇有声望。

关注龚鼎孳与皖江遗民人士的交游，有利于我们加深对皖籍历史文化名人的了解，同时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明末清初那段特殊的历史，从而突破某些固有的思维局限，获取不同寻常的新发现。